



第一輯

河北革命回憶錄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一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一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 3/8印张 182,000字 2插页 印数：1—3,8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09 定价：0.75元

前 言

自古燕赵多征战，周知关山育英雄。回望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征程，在我们河北的土地上，有数不清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有说不尽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话；有写不完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对于这些，需要回忆——记载——保存——流传，颂扬革命前辈，教育子孙后代。从这点出发，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河北革命回忆录》丛书。

当年，曾长期领导、指挥晋察冀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志，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并欣然挥笔为我们写了书题：“河北革命回忆录”。这对我们的出版工作是极大的关怀、鼓舞和推动。

在我们编的这套丛书中，所收文稿的原则要求是：从时间上，写抗战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事迹；从范围上，写在河北省境内的革命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忠于历史，事迹真实。

在硝烟弥漫、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同志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记载领导的、战友的、自己的战斗生活。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很重视革命回忆录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一九五八年河北省委曾发出了有关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指示，随之有不少同志写了回忆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把写革命回忆录，诬蔑为“涂脂抹粉”、“树碑立

传”，迫使写回忆录的同志投笔十年之久，在这段文化史上回忆录成了空白。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面目得到恢复，神州百业获得重兴。在这个历史春天里，我们殷切希望曾在河北战斗过的同志以对革命史料“抢救”的姿态，以对革命后代负责的精神，重新执笔，忆写当年。用我党的光荣传统激励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0094/7

目 录

博蠡地区的建党和农民运动……………王志远(1)

冀南春雷……………苏博光(26)

——冀南暴动片断回忆

贺龙同志在冀中……………吕正操(44)

挺进军在平西……………程世才(52)

生命,象火一样燃烧……………江一真(65)

——回忆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

战斗在大清河北……………王光霞(78)

回忆“五一”反扫荡……黄 桦 张硕忱 赵进元 韩守营(113)

对四次战斗的回忆……………储国恩(135)

冀中抗日根据地新闻工作史料……………李 麦(166)

深州城郊秋月惊……………林 呐(178)

指挥石家庄战役的朱总司令……………陈 靖(203)

——一九四七年的一束日记

昌黎城头红旗飘……………曾雍雅(208)

——记第一次解放昌黎

越战越强……………卢彦山(221)

博蠡地区的建党和农民运动

王 志 远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特别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劳苦大众，更是受着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地租等多方面的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

河北省博野、蠡县的农民群众，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当时这一带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每年除了政府的田赋预征和各种附加捐外，还要给反动军队出车辆，纳粮草，出兵，出伕，农民的负担非常沉重，再加上旱、涝、兵、匪天灾人祸，就更使得许多农民破产，生活无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对压迫者剥削者恨之入骨，渴望在共产党领导下早日翻身得解放。农民急切寻求革命道路，是我们在农村建党的重要思想条件。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南方各省和北方的一些大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白色恐怖，但这种白色恐怖还没有波及到博野、蠡县一带的农村。我党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博蠡地区进行了党的建设工作，开展了农民运动。

在博野、蠡县一带建党和领导农民斗争，我都亲自参加了，对当时的一些工作和斗争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博蠡地区党的组织是从保定发展来的。在一九二一年，邓中夏同志在河北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教书，那时他就在学校里传播马列主义，撒下了革命种子。到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保定的建党工作，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在保定育德中学、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保定二师）、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到一九二五年春，建立了保定市委。市委书记是史文彬同志，后为张廷瑞同志，下半年为张福堂同志。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党的工作范围，于一九三〇年四月又由保定市委，改为保属特委。

一九二四年我在保定二师读书时，和刘宪曾同学同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明确，我们学生党员的任务，除了在学校进行建党工作和开展学生运动外，还要利用假期回本县进行建党和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我利用假期到博野的小庄头，发展王老墨（病故）、宋鹤梅（一九三一年在北京牺牲）、王家楷（牺牲）、于化成（牺牲）等同志入党，建立了博野县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并组织了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王家楷同志在东墟村发展了刘树德、王珠（即王光照，牺牲）、王鸿章（牺牲）等同志入党，在龙堂村发展了刘亚曾等同志入党，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

一九二五年暑假，刘宪曾同志从保定二师毕业，到蠡县高小任教，他就在这里进行了建党工作。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发展了张化鲁、李耀庭等同志入党，建立了蠡县第一个党支部。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和一九二六年张化鲁和李耀庭又分别在蔺岗、大庄头、屯里等村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

这是博野、蠡县一九二七年以前建党的概括情况。

一九二五年暑假后，我因领导保定二师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从此我就专职做党的工作了。一九二六年在保定市委任组织部长期间，因被叛徒告密而被捕，一九二七年七月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中共河北省委（当时称顺直省委）组织部派我到博野、蠡县一带，继续作发展党的工作。

我接受了党给的任务，从天津（当时省委在天津）回到了家乡——博野县。首先巡视博野、蠡县原来的几个党支部和党员的思想、工作情况。

我到这些支部后，支部的同志对我说：“你坐狱时，支部工作照常进行。”我听后很高兴。

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要想开展革命工作，必须有个社会职业做掩护。所以在一九二八年春，我托人帮助，便在博野解村高小当了教员。利用上课的机会，给学生讲革命道理，用课余时间作农民的工作。当时农民协会正在反对豪绅村长，晚上我和协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办法。到了白天，农民就照我们研究好的办法从查账入手，让村长公布账目清单，从而揭穿他的贪污行为。这次斗争得到了胜利。

在这次斗争中，发现了积极分子，经过一个时期的培养，先后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了支部。在这个时期，还经常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到博野、蠡县的各支部去巡视检查和督促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我们在博野城里设立了“民益书局”，在蠡县设立了“蠡吾书局”和“文茂书局”。蠡吾书局经理杨登岸是共产党员，文茂书局经理刘德汗是共产党员，博野民益书局经理王有才是可靠的同情者，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开设书局的目的，是为了以此为掩护，便于和同志们接头、联系。并曾利用蠡吾书局做为和省委的秘密通讯处，利用博野的民益书局油印宣传品。这些书局都起了不小的革命作用。

当时，博野、蠡县养蜂、养兔成风。我们就在博野南白沙村

设立了蜂场，在东墟设立了养兔场。此外，还在小庄头王家楷（中医）家开了一个药铺。办这些事，也是为了便于彼此联系、商议党内事情。王家楷家的药铺是一个很重要的接头地点，我们的同志经常以看病取药为名，到那里进行联系。不但博野附近各村的同志常去，蠡县的同志和保定的同志们也常去，有时还在药铺吃饭，这个地方对开展党的工作起的作用比较大。

二

博野、蠡县的党员增加了，又建立了一些新的支部。一九二八年四月间，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建立了博蠡临时县委，指定我为县委书记，刘宪曾等同志为县委委员。由临时县委统一领导这两个县的工作。在这年的五月，博野、蠡县的农民协会都分别成立了。县委建立之后，领导的比较大的斗争就是一九二八年夏博野农民反抗“八厘公债”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捐税繁重，又连年歉收，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省政府下令，强迫博野农民购买六万一千元的“八厘公债”（年息八厘）。这实际是对农民敲诈勒索，群众对此非常不满。

根据这种情况，县委研究决定：由农民协会出面，发动博野全县农民开展反抗“八厘公债”的斗争。根据县委决定，党员以农协会员身份分头到小庄头、东墟、龙堂、西墟、小店、张岳、南白沙、小营、南杨村、沙窝、董家庄、解村、曹庄、吴王庄、北白沙、庄头营等三、四十个村子去串连发动农民协会会员参加斗争。

六月的一天早晨，会员们从各村拿着写有“反抗八厘公债！”“反抗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红绿纸小旗，喊着口号，分别到博野县城的东门、西门和南门集合。十点多钟，大约有一

千多人，分三路到县高小开大会。

当时公开出面领导斗争的是县农民协会主任宋鹤梅同志，他在会上首先作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说：“这几年来，苛捐杂税不断，地里收成又不好，咱们老百姓年年吃不饱、穿不暖、日子实在不好过，政府不但不救济，反而让我们买六万一千元的‘八厘公债’，这不是故意与咱们为难吗！老乡们想想，咱们买得起吗？”

大家喊：“买不起！”

“该买不该买呀？”

“不该买！”

“不该买怎么办呢？”

大家都举起拳头，扯起嗓门喊：“买不起就不买！”

宋鹤梅接着斩钉截铁地说：“好，买不起就不买！咱们现在就到县政府找县长去，说说咱们的困难好不好？”

大家一致说：“好！”

这时，人们就在宋鹤梅的率领下，打着小旗，喊着口号，到县政府去了。

队伍到了县政府门前，当差的就出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群众说：“我们为‘八厘公债’来找县长，你赶快给我们传禀！”

过了一会，县长出来了，他问：“你们有什么事？”

有人说：“为‘八厘公债’的事！”

县长说：“这是上边的命令，非买不可！”又说：“谁是代表？出来到‘西华厅’（县政府的会议室）去说说。”

群众说：“我们都是代表！我们是代表全县老百姓来的。有话就在大堂上说吧！”

有人说：“这几年政府不断跟我们要捐税，庄稼连年歉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账还不起，哪有钱买公债！”

又有人说：“老百姓生活这样困难，你们不设法救济，还硬要

我们买公债！政府说理不说理呀！”

接着，有一群人高喊：“买不起，就不买，坐牢杀头也不买！”

县长说：“这个事我自己做不了主，往上请示请示再说吧。”

群众说：“不管你请示不请示，我们就是不买！坚决不买！”

这时，大家喊起了“坚决不买‘八厘公债’！”“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县长一见群众这么大气，吓得面色如土，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以后，县政府再没有敢要“八厘公债”，全县农民反抗“八厘公债”的斗争胜利了。这是博野全县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在这次反对“八厘公债”的斗争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表现最积极、最勇敢、最坚决的是南白沙村的宋怀馨，运动过后，经过进一步培养，就把他吸收入党了。他又在本村介绍了徐芸圃、张汉杰、刘洛多等六同志入党，并且建立了支部。这个支部至一九三〇年，党员发展到十三、四人，成为当时比较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在领导该村反豪绅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宋怀馨同志又介绍了南杨村的张仓、张铎等同志入党，也建立了支部；在大营村介绍了赵怀庆等同志入党，也建立了支部。在反抗“八厘公债”斗争胜利之后，党的组织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党员质量一般也是比较好的。

三

一九二八年八月间，河北省委指示，把博蠡临时县委改为博蠡县委。指定我为县委书记，刘宪曾、宋怀馨、王之、于澄波（一九三一年在太原光荣牺牲）等同志为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

由于澄波兼任。县委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

一九二八年夏，博野小庄头翟树琦（即翟子瑜，后因背叛革命被处决）介绍了西章村边冠三（即边伯明）入党，秋天又介绍了博野城内李武宣入党，之后，李武宣又发展了王鹿鸣、王小波等同志入党，并建立了支部。一九二九年张岳村的于五增在董家庄发展了两个同志入党，不久，也建立了支部。在蠡县，又先后建立了滑岗、仇村、七器、万安、李家庄、辛兴、洪善堡、堡里、西百尺、宋家庄、邓家庄、东车里营、郝邱、北辛庄、南辛庄等党支部。

一九二八年夏，博野农民在党领导之下，取得反抗“八厘公债”的斗争胜利后，我们党又领导着博野、蠡县的农民群众，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反豪绅村长

当时各村掌握村政权的，一般都是豪绅地主，有的是他们直接出面掌权，有的是他们的代理人出面。他们是农民的统治者，是农村中的土皇帝。他们权势很大，可以随便给农民派粮派款，事先不说明理由，事后不公布账目。每次派的款极不公平，富户拿的少，穷户反而拿的多，穷人明知不合理，谁也不敢问。如果谁实在拿不起，要求缓交或少交，村长就大发脾气，把脚一跺，大眼一瞪，说：“你好大胆！敢抗公不交？少交一个也不行！晚交一天也不行！”穷苦百姓在这种威逼之下，忍气吞声，东摘西借把款凑上，给地主豪绅村长送去。

一九二八年，博野县小庄头农民协会就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对地主豪绅村长进行斗争的问题。在一次会上，村农民协会主任宋鹤梅（县农协主任兼任）说：“村长随便派粮派款，极不公平，

富家拿的少，穷人拿的多，他成年不公布清单，这里面肯定有贪污，可是咱们还不能问，这不是欺侮咱们穷人吗！过去咱们受尽了窝囊气，现在农民协会成立了，咱们不该再受他们的气了！”

经过大家讨论，决定从查账开始，揭开村长的问题。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间，宋鹤梅带领着一百多会员去查村长韩老宣的账。

到了村长家里，宋鹤梅就大声喊：“韩老宣！今天我们要查你的账，你要老老实实地说！”

负责查账的同志拿过账本一笔一笔地看了一会，问他：“富人一亩拿多少？穷人一亩拿多少？为什么穷人比富人拿的多？！”

他低着头，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问了他几条，有的他答不上来，有的说的与事实不符。大家都说：“账里有鬼！”宋鹤梅说：“告诉你，韩老宣！你如果不公布清单，我们不但交款，还要把你这个臭村长撤掉！”

等了好几天，村长也没有公布清单，群众便没有交款。经过农会讨论，就把豪绅地主村长韩老宣撤掉了，由农民协会中推选了两个有能力有威信的会员当了正副村长。从此，村政权由农民协会掌握起来了，这个村的反豪绅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胜利之后，过去不想加入农会的农民，也积极要求加入农会，因而，农民协会的组织越来越壮大，威信越来越高。继小庄头反豪绅村长斗争之后，东墟、南白沙、解村等村的农民协会，也都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与大豪绅村长进行了斗争，而且都相继取得了胜利。

铡 羊

当时，博野、蠡县一带有些土豪富家养着许多羊，祸害农民的庄稼。蠡县城北辛兴村有一个大土豪叫阎振江，他家养着三百

多只羊。在麦苗返青的时候，把这些羊赶到地里去吃农民的麦苗。

一九二八年春，这村的农民协会成立以后，在一次会员大会上大家议论：“阎振江的羊吃咱们的麦苗，他这样欺侮咱们不行呀！过去咱们怕他，有话不敢说，现在有了农会，不能再受他的气了，咱们得到县政府告他去！”

经过推选，找出了二十几个能干的会员为骨干，率领三、四百名会员，把阎振江家正在吃麦苗的三百多只羊，赶到蠡县县政府去告状了。

在县长审问时，阎振江坚决不承认他的羊吃麦苗，说是农民诬告他。在县长面前当然土豪说话吃香，县长偏听偏信阎振江的话，而农民则坚持所告属实，绝不让步。并说：“县长如果不相信，可以用铡刀把羊铡开看看，看看羊肚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县长不得已在大堂上当场铡了阎振江的二十多只羊，羊肚子里都有麦苗。在事实面前，县长没有办法，也只好当场判决：“许可阎振江养羊，但不许出圈放羊。”从此阎振江再也不敢让他的羊去吃农民的麦苗了。

农民反抗土豪阎振江的斗争得到了胜利，群众情绪非常高涨，认识到反抗土豪非有农民协会不行。从此，农民协会的威信大大提高，组织也更加巩固和壮大了，群众斗争的胜利信心更增强了。

砸 盐 店

在旧社会，盐店是官办的，县盐店的经理都是全县最大的劣绅，也是当地的实力派，骑在群众头上无恶不作。一九二八年，博野、蠡县的盐店经理勾结县政府，任意提高盐价，卖盐时给小分量，本来是十六两一斤，盐店每斤最多给十四两，并在盐里搀水、搀饭汤或是搀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

县委根据这种情况，专门召开了会议，讨论决定：由农民协会出面发动农民砸盐店。

会后，从各村农民协会中挑了二、三百个敢于斗争、年轻力壮的会员，在蠡县城里的一个集上，他们到县盐店门口一站，喊道：“你们盐店经理呢？快出来！”

站柜台的说：“出去干什么？”

“有事给他说。不出来不行！”这时盐店门口的群众有的跺脚，有的挽袖子。

站柜台的看到群众这么气愤，就赶快把经理叫了出来。

经理出来时躬着腰，嘴唇哆嗦着低声下气地问：“你们来这么多人，有什么事？”

这时，群众中有人带头说：“你好好听着！我们是全县农民协会的代表，我们问你，你卖盐为什么给小分量？你们为什么往盐里掺水，掺饭汤，还掺土？土能吃吗？说！”

盐店经理无言答对，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是在群众面前低着头哆哆嗦嗦地站着。当时，有个年轻的会员，一脚把这个经理踢倒了。接着大家搬了他的秤，把锅碗打碎了，把盐店砸了。农民群众向政府起诉告盐店，县政府不得已罚了盐店款，把罚的钱分给了各村的农民协会。

蠡县城里砸盐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接着蠡县的小陈，博野的东墟（这两个镇子都是区公所所在地），以及其他有盐店的地方，也不断发生农民砸盐店的斗争。此后，各个盐店卖盐再也不敢给小分量和随意提价了，也不敢在盐里掺水、掺饭汤和掺土了。

扫 盐 斗 争

博野、蠡县的农民，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因为年景不好，生活非常困难，买不起大盐，很多农民就刮盐土淋小盐。

除自家吃外，还可卖些小盐，维持生活。这样，官办盐店的生意就受到了影响，县政府说淋小盐非法，就派盐巡抓刮盐土的穷人，而刮盐土的穷人被生活所迫就非刮不可，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蠡县大庄头村党支部把本村刮盐土的穷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研究了对付盐巡的办法：把刮盐土的穷人组织起来。全村的淋盐户，成群结队的去刮盐土，如果盐巡抓人，就用扁担揍他。如果因打了盐巡去住班房，就让老婆孩子一起去，向县政府要饭吃。这个办法还真灵。一天上午，有十五、六个穷人，挑着担子一起去刮盐土了。大约刮到十一点的时候，有七、八个盐巡骑着马带着枪来了。这时，一个刮盐土的人一吹哨，大家喊：“兄弟们，下手打呀！”有的盐巡被打下了马，有的丢了枪，有的调转马头往回跑。

象这样打盐巡的斗争，先后出现了几次，以后，县政府再也不敢派盐巡到各村抓刮盐土的穷人了。这种斗争的规模虽然不大，参加的人数虽然不太多，但这是极其尖锐的斗争，农民的这种革命行动，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是一种有力的打击。

砸国民党县党部

一九二八年秋，博野县的国民党成立了县党部。党部的负责人有赵麟祥、孟光九、李景贤、张化鹏。

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致使国共分裂。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博野县过去跨党的共产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们党中央规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称为“跨党”）都很快退出了国民党。所以当时的国民党部里剩下的人都是打着革命旗号，净干坏事的国民党员了。

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建立之后，对过去的和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一律进行了登记。通过这个办法，整顿和扩大了它的组织。县党部的几个家伙以为大权在握，就神气起来了，他们穿着大褂，戴